

歷史研究的新視野： 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古今論衡 第11期 2004.09

今年是史語所創立七十五周年。過去七十五年中，史語所在臺灣的時間已經超過半世紀，而且遠遠超過它在大陸的時間，我們是應該定下神來，為過去五十年作一個回顧了。杜前所長在史語所七十周年時，倡導編纂了一系列書，如《新學術之路》、《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等，並大幅地增修了史語所的大事記，使得我們在撰寫這方面的文章時，得到很大的方便。

在過去半世紀，西方史學界也變得非常厲害，前年是卡爾（E. H. Carr）《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出版四十周年，英國史學界出現了一些文章，討論這四十年西方史學界的變化。^①我覺得有必要在此作一簡述。

卡爾四十多年前在劍橋大學作了一系列演講，後來輯成《什麼是歷史》，該書出版後，成為許多國家大學歷史系導論課的教科書。（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七〇年代後期，我在臺大作學生時，卡爾的這一本書就是常用書。而一直到八〇年代後期，當我在普林斯頓大學上博士班的史學導論課時，閱讀書目上的第一本書仍然是《什麼是歷史》。）在出版史或學科史上，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但卡爾並不是一位專業歷史學家，他曾經是記者，後來替外交部做事，然後教過一段時間的歷史。他最大的成就是十幾冊的俄國史，但是現在願意花力氣讀這部書的人，就像願意再讀湯恩比《歷史的研究》的人一樣，恐怕是少之又少了。然而卡爾卻意外地靠一本偶然之作而享大名，尤其是他那句「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不間斷的對話」的名言，更是膾炙人口。但誠如理察·伊凡斯（Richard Evans）指出的，卡爾自己的「對話」是失敗的，他主張史家在這種「對話」中指引現實的發展，但是他的俄國史在這個方面徹底失敗，其中的種種推測幾乎無一實現。卡爾認為俄國共產黨的計畫經濟及國有企業將會成為全世界經濟的模範，但後來的發展證明這個預見完全破產；他認為共產革命將在全世界成功，近幾年世界政治的發展也證明它站不住。這些錯誤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他是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相信歷史的發展會照馬克斯所指引的定律前進。^②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范毅軍、陳國棟、陳正國等同事的大力幫助，謹此致謝。

①如David Can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2).

②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pp. 196-197.

《什麼是歷史》在當時西方史學脈絡中的地位大致有幾點：第一、他鼓吹史學家應盡量吸收新興社會科學之長。第二、他認為史學家不只是為研究而存在，他的任務是要在與過去不間斷的對話中，指引未來的發展。第三、他區分「編年史家」與「歷史學家」之不同，編年史家滿足以一件史事接著另一件講下去，但史學家必須解釋史事之間的因果關聯。第四、史家不應專講幾個偉大人物，而應該指出歷史中較寬廣的趨勢，像階級的形成、經濟變遷、工業化、階級化等，而這些趨勢大多是不隨偉大個人的意志而轉移的。第五、史家要找出歷史發展之規律（regulation），或歷史發展的模式（pattern of past）。第六、卡爾認為英國史家應脫離英國或歐洲中心主義，要放寬歷史的視域到其他文明的歷史。第七、卡爾認為歷史仍然是一門科學，相對於之前柯林烏（R. G. Collingwood）的《歷史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似乎給人一種提倡歷史相對主義的感覺而言，卡爾仍要人們守住歷史的客觀性。^③在當時卡爾遭遇到幾方面的攻擊。他的主要論敵艾爾頓爵士（Sir Geoffrey Elton）的《歷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認為，卡爾是以社會科學來批評帶有實證風格的蘭克式史學，他不贊成卡爾所說的史家是時代的產兒，或用現在的角度選取歷史事實；卡爾主張放寬歷史視界，但艾爾頓不認為黑人有史學；卡爾主張社會科學治史，而艾爾頓認為最重要的仍是政治史、外交史等。

卡爾發表《什麼是歷史》，也就是從六〇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經歷了許多轉變，從政治史到社會科學，到社會史，到年鑑學派，到後現代與新文化史。反觀臺灣過去五十年，也大抵經歷了以上幾種階段的發展。六〇年代起，社會科學治史的風氣也衝擊了傅斯年等人所提倡的實證式史學，臺灣基本上也歷經了社會科學、社會史、文化史等階段的發展，^④目前後現代主義與新文化史對臺灣年輕一輩史學界的影響更是方興未艾。我們可以大膽地說，近五十年來，臺灣史學界基本上與世界史學的主流發展並不隔膜，而且流行的時距也愈來愈短。

③ 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是他對柏林（Isiah Berlin）的攻擊，尤其是對柏林《歷史的必然性》的批評。柏林的哲學很清楚地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的自由選擇與努力是非常關鍵的，所以他不滿卡爾太受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觀點。見John Gray, *Isiah Berl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6-97.

④ 詳細的論述，請見杜正勝，〈史語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代序〉，《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1-22；以及許倬雲先生為本次演講會所寫〈錦瑟無端五十絃——憶臺灣半世紀的史學概況〉。

現在重讀七十五年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旨趣〉）是很有意思的。〈旨趣〉中有一些常被批評的部分，像「反對疏通」、像「證而不疏」、像「推論是危險的事」、像「反對普及」等。史語所近五十年來的發展早已不受其限制，此處不贅，但〈旨趣〉中論及史學研究中的幾項要素至今仍有其價值：

第一，傅先生提到運用新工具，呼籲人們要充分運用自然科學所提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譬如地質學、地理學、考古學。第二是要發掘新史料，擴充新史料。第三是發掘新問題，尤其是要注意題目的新陳代謝，並留心「所持論的一些題目」是否係關鍵的問題。第四是新領域的開展，如當時西方學者所拿手的「虜學」及南洋學，又如當時西方學者所重視，而千百年來中國學者所忽略的，「如神祇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⑤此處我便想借用他上面所提到的幾個範疇來省視史語所過去一、二十年的發展。

一、新史料：我們與史料的關係正在改變中

史語所的前輩們已充分展示了史料在史學研究上的重要意義。傅斯年先生留學德國時，蘭克史學事實上已經走下坡，不是當時人矚目的焦點，它的一些重要觀念已經化作春泥，成為史界共同的營養，當時德國人文學界的重頭戲是理論的爭論，^⑥但傅斯年與陳寅恪他們似乎並不為所動。傅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材料）」的口號，經許冠三考證，可能是英國名史家崔衛連（G. M. Trevelyan）的名言脫胎而來。崔衛連說：「要研究法國大革命，人們必須上天或下地去尋找史料。」但是，如果我們細讀崔衛連的原書*Clio, A Muse*卻會發現，崔衛連其實相當反對蘭克史學，尤其不贊成過度重視史料的主張。^⑦從以上兩事可以看出，傅斯年相當熟悉當時

^⑤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見《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1301-1314。

^⑥ Lawrence A. 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 Culture, Politics, 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⑦ G. M. Trevelyan, *Clio, a Muse, and Other Essays Literary and Pedestria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3), pp. 9-10. 我的學生陳偉強先生告訴我這一點，我同時也參考了David Cannadine, *G. M. Trevelyan: A Life i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pp. 183-238.

英、德兩國史學界的潮流，但是他仍有自己的選擇。他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史學即是史料學」是一帖即時的藥方。其實已經有許許多多的人敏感地發現傅先生本人的歷史寫作並不見得忠實於自己的口號，他那幾篇膾炙人口的古史論文，早已運用了大量的歷史想像與歷史解釋，「史學即史料學」毋寧是他行文時慣用的矯枉務必要過正的手法。傅斯年先生認為，史料的進步與史學的進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他也認為一流的史學著作不能期期於每一個史學工作者，但是發掘、考訂、編纂史料的工作，卻可以使得平凡的人也可以作出踏實而持久的貢獻。

七十五年過去了，重視史料的觀點是否已經過時了呢？的確，有不少人隱隱然傾向於認為深刻的歷史解釋與史料之間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翻開一本出版不久的《新歷史》（*The New History*），卻看到這本書中所選擇的九位具代表性的新史家中，除了像Quentin Skinner那樣，是以一套方法論而樹立起其地位之外，大部分賴以成名的主要業績皆與一宗或數宗新史料的發現與運用有關。像Carlo Ginzburg在宗教審判檔案發現對Firuli一個磨坊匠的審判紀錄，寫成了他的*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像Keith Thomas在牛津圖書館Ashmolean Manuscript中發現十七世紀一位每年有超過兩千名顧客的命理師William Lily所留下來的紀錄，而開始寫他的*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像Daniel Roche發現舊王權到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一個眼鏡商（Jacques Louis Ménétra）的自傳，以之為基礎，重構舊王權時代廣大通俗文化的情況。還有他組織學生到巴黎各個大小檔案館抄出來的各種物質的與文化的消費紀錄，並從中研究法國文化的動向。像Robert Darnton由一條註一路追到瑞士的小城Neuchatel，在那裡發現近五萬通與出版商的通信，從而建構他啓蒙時代百科全書的歷史，這批材料也成了他後來幾本名著的主要材料來源之一。^⑧這只是一本新書中所列舉的新史家，在上述之外，還有許多相似的例子可以稱引。我只是想藉此說明，即使在新史學盛行的當代，新史料的發掘或對舊存史料不同層次的解讀，^⑨仍是成功寫出經典歷史著作的重要前提。〈旨趣〉中對新史料的種種

⑧ 以上見Maria Lucia G. Pallares-Burke,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p. 97, 115, 166等。同時參見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 XI.

⑨ 如Natalie Z. Davis, *A Life of Learning*, *ACLS Occasional Paper* No. 39, pp. 10-11.

主張，除了一些矯枉過正的話之外，即使到今天，也還沒有完全動搖。「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仍然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

在過去五十年，史語所獲取新史料的來源逐漸枯竭了，但是我也留意到，同仁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品類之廣，已經超出前輩的範圍，同時以另一種方式改變了史家與史料的關係，大幅地擴大了史家使用各種史料的可能性。我個人不算充分了解這個新現象，但卻直覺到這方面的新發展，將引起一種具有深刻意義的變化。

首先，在文字材料方面，我想談電子文獻的發展，在這方面史語所是世界漢學界的先驅。藉著網路與電子資料庫，使得研究者不再像以前那樣耗費許多時間反覆查閱史書（當然精讀史書仍是第一要義，才不至於脫離脈絡，也才能有機地掌握歷史），¹⁰或四處求索相關研究資訊，以建立相關的輔助性知識。大概五年前，電子化的圖象資料開始出現，以前只作為插圖的東西，現在比較容易獲得並且成為主要的解讀材料；以前可能只有藝術史家比較容易入手的，現在經濟史、文化史等學者也可以隨手運用，而且還可以藉助電腦，對圖象作細部的了解與分析。除了材料的取得外，過去獨學無友的情形，也可以靠著網路，拋出問題，尋求討論的機會。

三十五年前（1968），法國知名史家勒·華·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發表了一篇震動一時，但卻只有薄薄數頁的短文：〈史家與電腦〉。在這篇文章的末尾，他宣稱，至遲到八〇年代，史學家如果想要生存，他或她必須同時是一個電腦程式設計者。¹¹我們細看他所條舉的非電腦不可的領域，大致集中在人口史、物價史、家庭史等高度需要計量的領域，而批評者們則認為它與重視歷史解釋、重視歷史敘述、重視意義發掘的史學互相排斥。¹²

但是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證明拉杜里把電腦的功能想得太窄了，電腦不只能計量，它還有許許多多的功能。我個人完全了解過度依賴電子文獻資料庫治史的重大危

¹⁰ 關於史語所在這方面的發展，請參考黃寬重，〈中央研究院人文計算的回顧與前瞻〉及〈數位典藏與人文研究——中央研究院文獻資料數位化工作的回顧與展望〉，收於氏著，《史事、文獻與人物》（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139-220。

¹¹ E. Le Roy Ladurie, "The Historian and the Computer,"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3-6. 在這本書中拉杜里的那篇宣言式文章，與其他四篇性質相近的文章被收為一編，題為〈學習與電腦共存：史學中的計量革命〉。

¹² 這句話在過去二十年間常常被提出來調侃，如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London: Harvester Press, 1979;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85.

險，並且始終堅信，對於歷史文獻細密而又富想像力地解讀，仍是治史之首要條件，但是電子文獻也可以起一種畫龍點睛式的輔助作用。以史語所發展的漢籍全文資料庫看來，電腦與解釋或意義的發掘並不互斥，甚至還可以尋找到一個新的接榫點。

以下我想舉個人研究過程中的一些例證來說明。如各位所知，我是一個電腦盲，一切研究都處於手工的階段，但是在有限的使用中，卻體認到「漢籍全文資料庫」強大的力量。第一、近十年來，我一直在探討一個問題：清代的政治壓力之下文化領域的變化，其中牽涉到歷史記憶、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中自我壓抑等問題。在這個研究中，因為牽涉到太多壓抑在心中而不能說出來的層面，所以我戲稱之為「追索無聲的歷史」。我常需要了解敏感的書籍，或敏感的議題與字眼在整個清代浮沉的情況，這時候電子文獻便扮演無可取代的作用。

譬如有一次我想了解政治壓力對日常語言的影響，因為清代頭髮是敏感的問題，所以我設想在明代常用的「一髮千鈞」或「千鈞一髮」應該是犯忌諱的。但是我不可能通讀所有的文獻去印證這個假設，於是我請助理查詢本所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中《明史》的部分，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確定它從未出現過。當我想確定《揚州十日記》或《嘉定屠城記》等敏感的書籍是否曾經被公開提及或公開流傳的紀錄時，電子文獻庫也可以很快地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的電子文獻庫當然未包含所有清代的文獻，但是光從特定字眼出現的頻率也可以說明許多歷史事實。

第二、我的研究中，牽涉到近代思想中新概念的出現以及它們如何改變近代中國思維世界的問題，而漢籍全文資料庫常常幫我確定了它們的系譜。就以「傳統」、「主義」、「民主」等詞為例，為了確定它們是不是新出的詞彙，只要一敲電腦，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得到了答案：古書中從未出現現代意義下的「傳統」、「主義」、或「民主」。

我的研究中也牽涉到理學的詞彙如何影響到日常生活概念的問題。像「客氣」一詞，原先是理學家用來指斥、批評一個人的內心為習氣所拘蔽，本心不能作主，以致「客氣」作祟，所以宋明思想家常批評某人的行為帶著「客氣」，是一種貶義之詞。但是「客氣」後來用以表示一個人行為上的謙抑周到，反而成了正面之詞。想了解這樣的問題，也只能求諸電子文獻庫。

第三、電子文獻庫提供人們一種縱深理解的能力，此處再用「主義」這個觀念為例。「主義」是改變近代中國思想氣候的重要概念，五四那一代人非常嚮往「主義」，套用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管信從的是那一種主義，「有主義總比沒有主

義好」。這種以「主義」為萬靈丹的思維究竟如何一步一步網羅近代中國人的心靈，以致發展為「主義」崇拜，也是我所好奇的。而初步解決這個問題時也只需要一點點時間查漢籍文獻資料庫，然後很快了解到，晚清人們開始大量使用「主義」一詞時，它不過是指一種「宗旨」或一種「主張」而已，絕無後來那種「包山包海」的威力。可惜，因為我們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並未延及民國時期，所以民國以下的研究就得全部靠手工了。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追溯一個重大思想觀念的變化時，電子資料庫方便我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一個長遠的、縱深的輪廓，也可以對共時性的歷史現象得到廣泛的理解，因而可以進行更有把握的推論，同時也使得另一種層次的歷史解釋與歷史意義的追索成為可能。此外，電子文獻資料庫常常可以幫助我們確定「何者為某時代所無」，而「所無」本身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現象，沒有證據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證據，所以電子文獻是可以幫助我們把「空白」轉換成一種新的歷史證據。（在數位化方面，史語所還有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之「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錄與檔案」、「拓片與古文書」、「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圖籍」、「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內閣大庫檔案」等資料庫在進行。）

二、新工具：用空間來思考

歷史發展除了人之外，有時間與空間兩個軸心，「時間」方面已經得到史家充分的重視，但空間方面則重視不夠。人的行為有百分之八十會接觸到空間，日常生活、政治事件等都有許多空間屬性，此一屬性在過去因工具不足，或工具太過繁複，往往只獲得非常簡單的處理，甚至一筆帶過。

讀二十五史，許多帶有時間或空間的連續性，這空間有時是單純的一個點，有時形成線（如行軍），有的形成面（如災荒）。過去讀到這些史事時，最多翻翻譚其驥或其他人的歷史地圖，看某些點在何處，當涉及「線」或「面」時，往往腦袋空白一片。除此之外，像自然環境、氣溫、氣候、水文等構成要素，也往往被忽略了，因而對歷史知識的掌握常常流於片面。近年來，藉著電腦及網路的幫助，「地理資訊系統」把最現代的科技與傳統的知識整合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探索歷史知識；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創造了一種虛擬的環境，使得歷史研究者有機會走入一個虛擬實境，揣摩、體驗、重建並發掘過去的知識。

過去史學工作者們偏重用時間來思考問題，但上述這種新工具卻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問題。藉著這樣的工具，則傳統敘述性、描述性的東西，可運用這個架構得到一種視覺性的理解，或進行近似於量化的分析，使得傳統知識能掌握得更精準，用更具有全盤概括性的眼光去理解歷史現象。

例如研究大臺北盆地開發史，如果只有書而無圖，或只有簡單的地圖，則對整個開發過程由那裡到那裡，講了半天仍不知所云，沒有一個圖在腦海裡。有這樣一套工具，便可以化文獻的閱讀為空間的思考。又如考古學所常講的中國古代文化區系類型（蘇秉琦），到底有那幾個區系？有那幾種類型？如果把遺址點上去，再將文物擺進去，則形成一個層次井然的架構，可以據以作宏觀的思考。以我個人所關心之思想史方面的問題為例，中國思想史中長期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晚唐五代的禪宗與宋代理學的興起是不是有某種關係？而我們閱讀古書得到的一種粗淺印象，似乎禪宗流行的地區與理學興起的地區有某種有趣的重疊性。如果我們能藉助地理資訊系統把空間上的思考作為追尋思想系譜之輔，則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也應該有意想不到的成果。

空間的思考除了擴大歷史的視界，使我們可以得到另一「面」，甚至是立體的知識，還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作更高層次、更概括性的、更具有動態觀的思考。

三、新問題

在開拓新領域，發現新問題方面，過去十幾年來，史語所已有許多成果。正如目前所裡七個研究室及八個研究群的題目所顯現的，¹³所裡比較自然形成群組的研究領域中，有文物圖象、有宗教禮俗、有生命醫療、有文化思想、有法律史等。相對於過

¹³這七個研究室分別是：「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法律史研究室」、「禮俗宗教研究室」、「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臺灣與東南亞考古研究室」、「世界史研究室」、「文物圖象研究室」；研究人員自組的八個研究群分別是：「中國歷史上的制度與社會」、「宋代基層人物與社會」、「近代歐洲的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澎湖七美現生貝類補充調查及史前貝類碳氧同位素分析研究」、「連江縣莒光鄉熾坪隴遺址發掘出土遺物分析研究」、「鬼與怪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對勘與互證」、「中國青銅文明研究」。

去半世紀的發展，這些領域都相當之新，也有一些是過去處於邊緣，現在轉入核心的，所處理的問題也有許多過去意想不到的。所以傅斯年先生在〈旨趣〉中所說的：發掘新問題及注意题目的「新陳代謝」，現在已經不成問題，卓然有成。下一步的任務應該是不管在這些新領域或原有的領域中，尋求並解決重大問題，一如日本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年鑑學派之「整體史」的觀點，及以西洋中古史為主、由下而上地了解歷史，英國劍橋一群歷史人口學者之解決小家庭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或是工業革命之前的舊況等等。發現新領域之餘，還要抓住幾個重大問題，做得與別人不同，只要五到十年，便可以成一氣候，很快地便能引起學界的注意。

新領域通常新奇可喜，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即一旦沒有聚焦或沒有重大問題時，很容易產生「零碎化」的現象。譬如當Natalie Davis出版她的*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時，有人非常不滿地表示，Martin Guerre居然變得比馬丁路德還有名，甚至更重要。事實上，如果能將Martin Guerre放在宗教改革這個大問題下來看，就可以免去輕重倒置，甚至「零碎化」的傾向。¹⁴

四、眼光與態度

近年來史語所治學的眼光有兩種下降的特色：一個是時代的下降。以考古學來說，由三代考古而開始重視歷史考古；以歷史而言，由上古秦漢為主而下降到宋代以後，尤其是明清歷史。第二種下降是由了解上層為主下降到庶民的研究、對基層社會之注意，對生活、禮俗、宗教、醫療之興趣等等。同時我們也看到三種研究態度上的轉變。第一是由前一代五四青年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轉而以同情的理解或溝通的態度，看待歷史文化中的生活禮俗或「怪力亂神」的層面（如今天的題目之一〈從除魅到牽亡〉所顯示的）。第二是對過去一筆帶過的，或甚至認為是干擾的層面，正面地加以處理；一改過去認為某些現象僅只是一種偏離、脫軌、待矯正的，改為正視它們所展現的特質，正視其本身之創造，從而開啓了一個新的研究世界。第三是臺灣成為研究的主題，以及以世界史的視野來看中國歷史。

¹⁴ Pallares-Burke, *The New History*, p. 69.

今天的史語所與它初創時有一點不同。傅斯年先生創所時，聚攏了一批已經嶄露頭角的中壯學者，同時還有幾個大學作為教育訓練的基地，有一大群由第一代領導人們識拔的學生及年輕人圍繞在他們周圍。他們是老師，同時也是指導者，可以比較從容地實踐傅斯年勾勒的學術理想，這個情形與法國年鑑學派的情形相近。年鑑學派一直到第三代的主要成員之間，也大多有這樣的關係。¹⁵史語所在過去幾十年間，慢慢地失去（擺脫）了這種「三位一體」的特色：研究人員來自各個不同的學校，而且大多經過外國大學的培養，好處是多元化，缺點是較難形成一個具有主流風格的歷史學派。史語所應在被動地吸收各地人才的同時，主動地塑造一種學術風格，形成幾個學術重心，這是塑造一個學派的前提。

如果要塑造一個學派，史語所要有陳寅恪那樣單打獨鬥的高手，也要有殷墟發掘那樣的重心。這個重心可以像它創所的最初二十年那樣，是以新史料為主發展而成的，也可以是以新方法論、新視野，或新的重大課題為中心而產生。

史語所應形成一個聯通所內外以及國際同道的對話社群，而且要與年輕一輩密切結合。過去十年間，史語所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大致做到這一點，他們除了與各地學者互通有無之外，從其活動的參與者到演講者看，年輕學生佔有重要比例。事實上，史語所有資源也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在這裡我想舉個例子，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那一天，史語所的大樓裡有四場學術活動，一場是臺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論文發表會，一場是文物圖象研究室的演講，一場是法律史研究室的讀書會，一場是語言所的南島語言研習班，出入這四種活動的學者與年輕學生恐怕超過兩百。它給我一種感覺：史語所除了是一所研究機構之外，同時也是一所學校；它是提供專題的、新領域的溝通討論的場所，充分體現了我們這個所與各大學攜手一起成長的理想，這是形成一個學術社群的前提。

問題是主導這個社群的對話主體是臺灣，還是外國？這個對話社群當然不能自外於國際，但是應該形成自己的主體性，免得被世界所稀釋，或陷入不斷複製外國的窘境，就像七十五年前傅斯年那一代擔心人們不斷複製傳統一般。

¹⁵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史語所應當領導學術議題。史語所創所之後二十年間，它的方向相當清楚，希望迅速作到傅斯年先生在〈旨趣〉中所宣示的，要讓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它一開始的氣派顯然很大，表面上處理歷史文獻、史料等，但根本想法是重新解釋中國歷史，一方面要脫出傳統的羈絆，另一方面要與歐美、日本競爭。他們在開拓研究史料方面的實績及開啓研究方向上的成就，不必在此重述，但我覺得另外一點更重要：今天的史語所除了應該繼續堅守它深刻細密、樸實無華的學風外，也要能領導議題。我的整體感覺是三〇年代，史語所的議題是自己的，現在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特別是八〇年代以後，史語所與國際學術主流互動益形密切，開展了許多有價值的課題與領域。但可能因為知識背景與外國太過接近，比較缺乏創造議題、領導議題的自覺或決心，常常是在世界主流中尋找議題。所以雖然做得很細密紮實，問題解決得很深入，但應該提出一些別人不得不聽的議題，這恐怕才是史語所進入「新傳統時代」時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篇原在2003年12月22日，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演講會上發表）